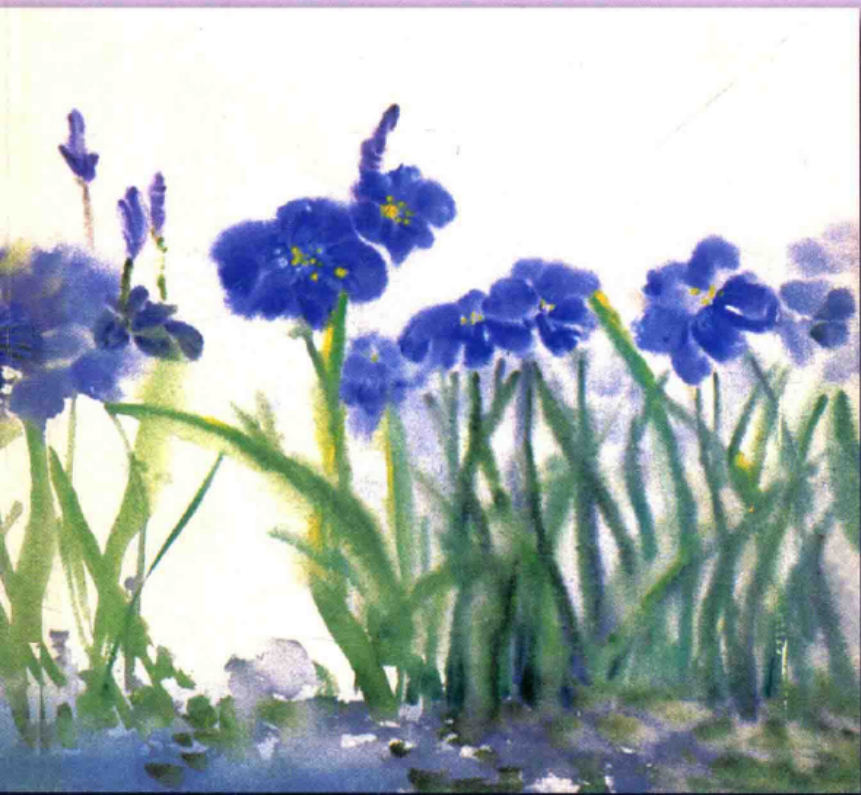


嘉善五十年作品选

第一卷 文学



嘉善县文联
嘉善县文化局

总 序



《嘉善五十年作品选》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它是我县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成果的集成,是向新中国诞生五十周年也是向全县人民献上的一份宝贵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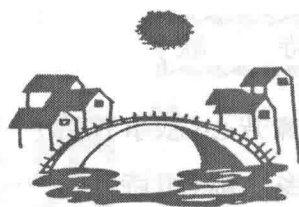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半个世纪中,我县的文艺创作承传统文化之渊源,沐改革发展之雨露,有如百花盛开,繁华似锦。文学、民间文艺、美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等出现了许多佳作精品。本套书共五卷选辑的280余件作品就是其中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代表作。

我很喜欢这套集子。这是因为这些作品都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活动息息相关,反映了嘉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火热场面和感人情景,热情讴歌了勤劳智慧的嘉善人民,讴歌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讴歌了五十年的巨大建设成就,读来使人激动,令人振奋;是因为这些作品演绎的是嘉善人、嘉善事、嘉善故事,具有浓郁的嘉善水乡特色,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使人亲切,耐人回味;还回为这些作品都凝聚了作者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给人享受和熏陶。我相信,大家也会喜欢它、珍视它。

面对这套集子,除了祝贺和感谢,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衷心希望我县的文艺创作以此为新的起点,在新世纪的旅途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中,谱写更多更新的新篇章。

嘉善五十年作品选

第一卷(文学)



扉页题字:高梦良 莫建林

嘉善县文联
文化局 1999年9月

总序 陈浩

纪实文学

- “为革命牺牲最光荣”报告文学 许春华(1)
- 我们万众一心(特写) 《嘉善报》编辑部(13)
- 求取最大值(报告文学) 金天麟(16)
- 抗洪日记(特写) 陆勤芳(23)
- 五吨胜万吨(报告文学) 徐彩鹃(25)

小说

- 乡恋(中篇) 蒋胜强(27)
- 抢轿(中篇) 金梅(34)
- 斜塘旧事(中篇) 界愚(42)
- 白妹婆婆(短篇) 舒叶(55)
- 名医(短篇) 倪立新(57)
- 赌徒(短篇) 苏枫(58)
- 小小说两则 夏梅萌(62)

影视文学

- 疾风劲草(电影文学剧本) 金梅(64)
- 古镇西塘(电视专题片) 金天麟(81)
- 龙凤换(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梗概) 金梅(84)
- 黄酒魂(广播剧) 金天麟 曹琦 李嘉(95)

诗 歌

诗魂芳心(叙事长诗)	蒲祖煦(103)
水乡之歌(组诗)	管立人(111)
诗五首	张敏华(114)
致北方	王晨光(116)
乡村情感(组诗)	苏 枫(117)
芦花缤纷(歌词一束)	芸 芸(119)

散 文 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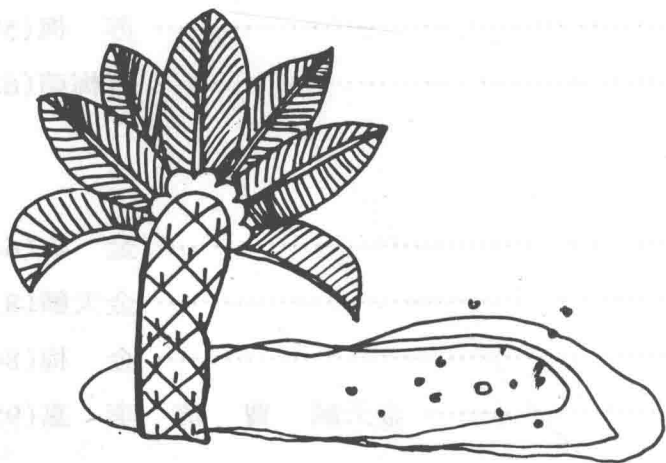
掠不去的身影	小 萱(120)
秋日	晓 婷(121)
海(外一章)	夏梅萌(122)

散 文

愿我们永远年轻	舒 叶(123)
船的故事	蒋胜强(124)
我在韩国讲学(随笔)	韩金梅(125)

文学评论

情感与创作	姜汉林(127)
-------------	----------



策 划 李建国
主 编 金 梅
剧 编 戴雨频
编 委 石 强 沈瑞华
金天麟 周向阳
姜汉林 黄涌国
蒋彬宽

“为革命牺牲最光荣”

——袁世钊传略

○ 许春华

“为革命牺牲最光荣。

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

不过时间关系，

等着吧，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消灭。”

——这是袁世钊就义前所写的遗书中的诗句

—

入夜，寥廓的江南平原，一片死寂。只有远处的春雷，一阵一阵隐隐约约传来。风，吹过学校围墙边的一排楝树，丝丝作响，把这暴风雨前的雷声带到校园西侧的那排低矮的平房内。一会儿，雷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响。

这是1924年的第一阵春雷。

袁世钊怎么也睡不着，他兴奋地攥紧双拳，右手不停地挥舞着，脸色也因过于激动而胀得通红，他坐起来，两眼紧紧盯着窗外那一片漆黑，嘴里念

念有词，象在背诵着什么。

他确是太兴奋了，刚才在他那间狭小的屋子里举行的仪式，又在他眼前闪现。松江中共党员侯绍裘陪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青年团中央工作的萧楚女来到他的屋子里，郑重向袁世钊宣布，经组织考察批准，他已经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向党作出了庄严的宣誓。

“……为了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袁世钊举起右手，轻轻而又有力地宣誓。恽代英望着眼前这位身材挺拔、英武之中略带书卷气的年轻人，高兴地说：“从这一刻起，你已经与世界上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今后，你们要在松江、嘉善，特别是枫泾一带，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把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萧楚女用手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对坐在身边的侯绍裘、袁世钊说。

回想起两位革命家的话，袁世钊激情澎湃，胸中涌动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那是一股要把自己整个儿地融化到革命事业中去的激情。他拿起身边的笛子，兴奋地吹起了他最喜欢的那首《梅花三弄》的曲子。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当激动的时候，他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吹起笛子。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脑子里象江水一样翻滚着。他也知道革命的艰难，但他毫不畏惧。



他伸出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一只茶盖由于震动,掉到砖地上,摔得粉碎。

这一年,袁世钊刚满22岁。他也成了嘉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位年轻的知识青年,从此走上了反抗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革命道路。

年轻的袁世钊,自小就一直生活在枫泾。当时的枫泾,一桥跨两省,镇中的市河把整个水乡古镇分为南、北两个小镇,河南的南镇属于浙江省嘉善县,河北的北镇属于江苏省松江县。嘉善县的一个基层行政局(后为区公所)就设在南镇,而北镇则设有松江的一个行政局。袁世钊的家就在两省交会之处的南镇下西街,一户典型贫困市民的家庭。父亲袁友鸿,曾在南镇开设烟纸店,由于百姓贫穷,生意清淡,后来便外出做些小生意,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因此家庭非常贫苦。家里有兄弟4人,他排行第三。他幼年就读于枫泾镇养正小学,毕业后转入北镇第三高等小学读书,修业期满后就在当地小学任教。后来全家迁居到枫泾乡下,他便到当地农村小学教书,到1924年,才又回到枫泾母校第三高等小学任教。

袁世钊的少年、青年时代,正处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象一块巨石投入到了沉寂的河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五四”新文化、新思想象春风一样吹到了这个江南小镇。袁世钊,这位有抱负、有思想的小学教师,也和其他进步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上的每一篇文章,对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那些雄辩滔滔,壮怀激烈的文章,更是十分心折,有些文章,他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为了把这些进步思想传播到普通民众当中,袁世钊和其他几位进步青年先后创办了《微光报》、《黎明周刊》等进步刊物,揭露批判社会弊政,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这些刊物的出版,在枫泾以及周边地区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袁世钊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分析,初步展现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锋芒。

1923年,当袁世钊聆听到前来枫泾宣传马列主义、共产党纲领的恽代英、萧楚女,以及侯绍裘的

演说时,就更热血沸腾了,他从这些学说和纲领中看到了光明。就在那个初冬的深夜,他向组织表达了自己希望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你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是一个好样的青年。”萧楚女一边握住他的手,一边有力地拍着他的肩膀。袁世钊从那双有力的手上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现在,袁世钊已经结束党组织在上海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回到了枫泾。这个时候,他的肩上已经担起了党的任务。党指示他回枫泾开展革命。

他和党组织派来的萧楚女一起,到枫泾南栅励志学校集会演讲,第一次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袁世钊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迅速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小组,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还在茶馆、街头宣传演讲,控诉外国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工人的罪行,每一次演讲,袁世钊都泣不成声,使听众非常感动,纷纷解囊捐款,支援上海受难工人。

除了宣传先进思想,组织民众反抗强权,袁世钊的另一个任务则是培养、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这时候,在松江参加了共产党的同乡陆龙飞受党组织的指派,回到了枫泾。从此以后,袁世钊、陆龙飞这两位共产党人,成为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

而枫泾,成立党组织的时机也已经成熟。

1926年7月,历史记住了这个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嘉善最早的组织——中共枫泾独立支部正式成立。袁世钊出任支部书记,支部还有陆龙飞等4名党员。它直接隶属中共江浙区委。从这一刻起,嘉善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也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

黑幕重重之中,嘉善不再是孤岛。

革命的火种点向哪里,哪里就会燃烧起熊熊烈火。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袁世钊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的工作中去。一到晚上,他便脱下在学校里穿的那件灰布长衫,换上短衫,来到农民低矮、破败的茅屋里,和农民们围坐在一起,向他们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思想,宣传“实行耕

者有其田”的主张。每来到一户农家，他总是对围聚拢来的农民兄弟说：“参加农民协会，农民团结起来，可以不受地主土豪欺压，可以提出减租减息的合理要求。如果地主不让步，我们就不交租，有事农民协会担当。”一时之间，农民兄弟的心被他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说得暖乎乎的。他们一见到袁世钊，就都纷纷向他倾吐心中的苦水。后来成为农会骨干、共产党员的顾桂龙，一见到袁世钊就叫他“恩人”，并说：“跟着世钊，有饭吃，有好日子过。”仅仅两个月时间，袁世钊和农民兄弟们便在枫泾城隍庙的积谷仓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一下子达到五六百人。成立大会上，袁世钊望着从四百八方赶来的农民兄弟，兴奋不已，他站到条凳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还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口号声刺破了浓重的乌云，象发出了一支支反剥削、反压迫的利箭。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积谷仓一度成了农民运动的活动中心。这一年秋收，农民协会与封建地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农民运动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统治集团的震惊和恼怒，以省参议员叶桐叔为首的21个地方豪绅，联名向军阀政府控告农民协会“霸租”，他们吼叫：“农民要造反。农民协会是他们的后台靠山。”形势一时箭拔弩张。11月的一天，军阀政府终于派来军警，驱散了集中在积谷仓的农民、封闭了农民协会。袁世钊挨了几棍，当他赶到陆龙飞在枫泾白牛塘村的土地庙小学的宿舍时，后面响起了枪声。

“世钊，反动军阀下手了？”陆龙飞看到袁世钊手臂上被打伤的地方，焦急地问。

“虽然他们驱散了农民协会，但农民运动是镇压不下去的！”袁世钊捏了捏手臂上紫色的肿块，语调坚定地说，“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宣传发动，唤醒了民众，让他们认识到了遭受剥削、压迫的根源，认识到了只有团结起来斗争，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二

1927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年，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年初，北伐军即向浙江挺进。为了配合北伐军，袁世钊、陆龙飞领导组织了农民协会武装队伍，在沪杭铁路枫泾水旺村、宋浜一带，进行破坏铁路、扰乱军阀孙传芳的交通运输的斗争。2月上旬的一天，袁世钊、陆龙飞探知军阀有军用弹药车要经过枫泾，袁世钊当即组织原来农会骨干王子琴、张杏松、薛照生等人，与上海党组织派来的5位铁路工人一起，于深夜在枫泾宋浜至水旺村一段切断电话线，撬掉铁路铁轨。正当袁世钊他们紧张地撬卸铁轨的时候，被敌人护路车发觉，敌人疯狂地用机枪扫射，袁世钊急忙掩护同志们分散撤退。等大家撤离后，他自己最后才泅水撤回到钱家草，隐蔽到顾桂龙家。“军阀很狡猾，竟然派了护路车。不过，他们没让我脑袋开花，我不仅要撬他们的铁轨，还要敲他们的脑袋。”袁世钊一见顾桂龙开门，不等脱掉透湿、冰冷的衣服，就幽默地说。

“北伐军已进驻杭州，不久将抵达嘉善，请你立即前往嘉善魏塘筹建国民党嘉善临时县党部。”2月底的一天，袁世钊接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马上赶到魏塘，找到住在东门日晖桥的表兄、外科医生徐山涛，并以他家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当时，军阀政府委任的知事（后来称县长）、警察局长、驻军都已闻风远遁。袁世钊多次在徐山涛家和北门外新安会馆（北门义园）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筹建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发动和组织民众迎接北伐军。

“我们要上街演说，让民众知道军阀的反动，了解北伐军是为了统一中国，推动革命的。”袁世钊扫视了一遍围坐在八仙桌旁的李青云、王震一、毕任庸和丁壮如，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还要举行庆祝游行。”

“这是宣传革命的一次极好机会。”李青云点了点头，补充道。

会后，袁世钊就走上街头，来到泗洲塔下，对着群众，他大声宣传：“军阀祸国殃民，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面对着如此慷慨激昂的演说，许多群众都停下脚步，认真地听了起来，一时掌声四起。当时的泗洲塔附近，是魏塘的一个集贸、游玩中心，店铺处处，游人挤挤。袁世钊选择这个地方，是具有相

当的风险的。

不久,北伐军到达嘉善。袁世钊即组织民众夹道欢迎,晚上还举行了提灯庆祝游行,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庆祝嘉善光复。那一夜,魏塘镇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

3月,国民党嘉善临时县党部在徐家弄女子高等小学正式成立。李青云、袁世钊、王震一、毕任庸、丁壮如、沈修彦、胡味辛等13人组成了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执行委员会,袁世钊任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

袁世钊知道,现在是宣传革命,开展革命活动的最好时机。他要紧紧抓住这个时机,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3月上旬,北伐军薛岳部队进抵嘉善,袁世钊、李青云即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领导和组织了一次胜利大游行,参加游行的民众情绪激昂,一个个手挥纸旗,高呼口号,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与此同时,袁世钊还以国民党嘉善临时县党部的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他深入到善益布厂,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领导和组织工人为维护正当的经济利益开展罢工斗争;在嘉善初级中学,他通过校长胡兆焕等向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在农村他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从早到晚,袁世钊都处在兴奋的状态,他对表兄徐山涛说:“我有干不完的工作,使不完的劲。你们用不着等我回来吃饭,我随便在哪里,都可以吃到饭。”的确,袁世钊在革命活动中培养了一批工农骨干。他善于联系和团结群众,与工、农、学生打成一片,和他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袁世钊领导的工人、农民、学生革命运动,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自然也激起了他们的恐惧和恼怒。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沈修彦、胡味辛勾结土豪劣绅钱绛年、沈肃平等声称:“县党部为共产党所盘踞。”他们煽动国民党县党部逮捕袁世钊。一天深夜,袁世钊还在县党部埋头撰写宣传材料,突然闯进了几个地痞,尽管遭到袁世钊的严厉斥责,几个地痞还是强行将他抓到了县政府,逼他供认是共产党——袁世钊当时未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原来,这是沈修彦、胡味辛策划的一次阴谋,这几个地痞也是他们纠集的。

这起暴行,激起了县党部中多数左派和民众的愤慨,掀起了声势巨大的罢工、罢课风潮,许多民众拥到县政府,强烈要求释放袁世钊,惩办肇事者。县长田稔慑于群众威力,不得不马上释放了袁世钊。袁世钊在群众的簇拥之下,昂首挺胸步入礼堂,他慷慨陈词,边走边对拥上前来的群众大声演说,痛斥右派蓄意陷害,表示坚决支持工农运动,拥护北伐革命,反对封建势力,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一场反对国民党右派顽固势力的斗争以胜利告终。

这一年,蒋介石出于反革命需要,培植亲信,任命腐朽无能的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消息传到嘉善,袁世钊立即挺身而出,发电至省政府:“‘瘫痪老人’主持浙政,不能负革命大业,希当局收回成命,自告引退。”其大义凛然,充分体现了袁世钊心系革命、胸怀苍生、忧国忧民的革命品质和铮铮风骨。这一电文,也使国民党省政府开始“密切注视”袁世钊的“动向”了。

这年的4月12日,一个黑暗的日子,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紧接着,各地也纷纷开始“清党”。一时之间,乌云密布,腥风血雨。嘉善的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也蠢蠢欲动,伺机反扑。驻嘉善一带的国民党76军周凤歧派员进驻了县党部,监视袁世钊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袁世钊的行动受到了监视。他的身后总有两个尾巴紧随着,甚至在表兄徐山涛的屋门前,也总有一个斜叼着香烟的流氓在踱来踱去。袁世钊无法开展工作,被迫离开嘉善。他秘密到了嘉兴,在濮院,他找到了嘉兴党组织,并与嘉兴党组织负责人顾作之取得了联系。两人商议后,立即从水路转移到了上海,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情况。几天后,袁世钊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又返回枫泾。那时嘉善一带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农民协会已被封闭,活动停止,而且国民党省政府已获悉袁世钊是中共党员,阴谋密捕他,斗争环境十分险恶。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他更多地回想起三年前入党时的情景,特别是回想起恽代英、萧楚女对他的殷切期望。每一次想到恽代英那期许的目光、有力的双手和萧楚女

那几句铿锵的话语,袁世钊总是热血沸腾,内心似乎有一股可以冲决一切的力量汹涌澎湃着。他知道,这两位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是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的。因此,袁世钊置自己生命于度外,仍然坚持在枫泾农村开展革命斗争,与陆龙飞、顾桂龙等党员一起,挨家挨户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我们种田人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不得温饱;官僚地主不耕不作,却穷奢极欲,花天酒地,这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制度造成的。我们只有起来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翻身得解放。现在我们要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与剥削阶级作坚决的斗争”。袁世钊的循循善诱,象一股股暖流,流进了贫苦农民的心田,他们纷纷踊跃参加农民协会。一次,袁世钊、陆龙飞、顾桂龙在钱家草村西的大方庵召开农会会议,附近八个村的1000多贫苦农民都赶来参加大会。就这样,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又开始了抗租抗税斗争。在斗争中,袁世钊他们又培养发展了一批农民骨干入党,在八个村里发展了2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发展壮大。

三

秋天的江南,天高云远。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稻谷的香味。一群群麻雀飞上落下,远处还不时传来一两声“哞哞”的牛叫声。

袁世钊昨夜两点多钟才回到家里,此刻,他正坐在西边的小厢房里,起草向上级党组织的汇报材料。他不时地抬起头来,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那一大片开始黄熟的稻子。“唉,丰收,却仍然要挨饥受饿,苦难的人民啊。”袁世钊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父亲轻轻地走过来,小声说:“世钊,有个人找你。”

袁世钊警觉地站起来,“什么人?”他问。

“他说他是组织上派来的,有重要事情商量。”父亲收起桌上的墨盒,示意儿子到外面的堂屋里去。

堂屋里,一位看上去十分精干的小伙子端坐着,看样子比自己小不了多少。一看见袁世钊出来,赶紧迎了上来。

“袁世钊同志,我是陈云同志派来的,叫吴志

喜。”来人急急地对袁世钊说。

“啊,你就是吴志喜同志。”袁世钊紧紧握住吴志喜的手,喜出望外地轻声叫了起来,“陈云同志回到家乡来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陈云同志希望你马上到黄渡,有重要的精神传达。”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9月,中共江苏省委指派陈云负责松江区(包括松、金、青等县)的农民运动。陈云回乡后,立即与青浦的夏采曦、吴志喜,浦南的李一谔,枫泾的袁世钊、陆龙飞取得联系。

袁世钊赶到黄渡,夜已深了,浓重的露珠打湿了他的裤管,风吹来,有一丝丝的凉意。

吴志喜领着袁世钊、陆龙飞来到了村东头的一间小屋里,一盏菜油灯,摇曳着红红的光。袁世钊一跨进门,就觉得一股暖意迎面而来。

“袁世钊同志、陆龙飞同志,辛苦了。”端坐在中间的一个瘦小精悍的人,站起来招呼两人。瘦削的脸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就是陈云。陈云与袁世钊是初次见面,陈云凭着丰富的社会和人生经验看到眼前这个衣衫精糙、单薄而又不失读书人那种干净、利索的年轻人,微圆的脸上那双眼睛充满了精神和热情,一下子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

“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发动秋收起义。组织决定要求我们在松江、金山、青浦、嘉善这一带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这一带地处江浙交界,一旦农民暴动发动起来,必将极大地震慑上海、江苏、浙江的反动统治势力。”陈云有力的声音,鼓起了大家的激情。

会后,已经多次见面的吴志喜,摸了摸袁世钊斜插在挎包中的竹笛,笑着告诉陈云:“吹笛子是世钊的拿手好戏,暴动成功后,我们请世钊尽情地吹几首曲子让我们听听。”陈云拍了拍袁世钊的肩,亲切地说:“想不到世钊同志还有这雅好,到时一定洗耳恭听。”

黄渡会议后,农民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袁世钊四处奔走,他把整个身心全都投入到了宣传发动农民群众的活动之中。农民协会的队伍

比几个月前壮大了五六倍,农会会员发展到了上千人,并收缴了水警的枪支,建立了农民革命军武装队伍。这个时候,枫泾地区的农民运动已和青浦小蒸一带的农民运动联成一片。

11月,中共青浦(松、金、青)县委和枫泾区委相继建立,陈云任县委书记,吴志喜任县委常委,袁世钊任县委委员兼枫泾区委书记。

这年秋收以后,声势浩大的抗租抗税斗争,使这一带的土豪劣绅都龟缩家里,不敢出来逼粮收租。

农民武装暴动的烈焰,一点即燃。因为地火早已经在酝酿,一旦喷发,那是连岩石都要烧化为浆水的。

寒冷的冬风,吹过空旷的田野和寂静的村庄。一位衣衫单薄的妇女,正在用细长的竹杆敲打楝树上稀稀落落的几串楝核,她的儿子蹲在地上,一会儿用嘴呵呵手,一会儿又蹲下去捡拾母亲打下来的楝核。据说这东西可以做中药,家里实在没有一块钱过冬,那位年轻的母亲不得不冒着寒风,拉着儿子,去打些楝核,卖一两个钱。

突然,三四个戴着皮帽的人,冲了过来,还没等那位母亲反应过来,几枝枪已经对准了她。她吓得尖叫一声,赶紧抱着也被吓得哇哇直哭的儿子。那几个举着枪的人,逼着她回家,要她交清去年的租米。

这是1928年1月3日,小蒸地主汪倾千、地保胡祖文勾结章练塘水警队长袁伯祥,带着武装人员,来到小蒸乡下逼租。

正在西乡的袁世钊,听到汪倾千出来逼租,立即带领王子琴、曹叔明等农民革命军武装队伍赶到小蒸。这时候,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吴志喜、陆铨生已经率领小蒸农民革命军向汪倾千逼租的那个村子进发,两股农民革命军正巧在村口会合。

农民革命军每个人的颈间都系着一块红布条,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有长枪、短枪,也有锄头、铁鎗。队伍喊叫着,直往前冲。袁世钊和吴志喜跑在队伍的前面,袁世钊一边跑,一边高喊:“活捉汪剥皮,枪杀狗腿子胡祖文,狗皮警察袁伯祥!”

村子里也热闹起来,刚才紧闭的一扇扇屋门,纷纷打开,农民们一个个探出头来,高兴地鼓起掌,

许多人也都拿了竹篙、铁锹走进了队伍。袁世钊兴奋地招呼着大家:“农民兄弟,跟我们来,一起参加起义!”

队伍直奔那位妇女家。屋子里一片狼藉,妇女的双手被反绑着,嘴角淌着血,小男孩抱着妈妈,哭得已经有点嘶哑了。

袁世钊一个箭步冲过去,解开了那位妇女的双手,焦急地问:汪剥皮呢?他们是不是逃走了?”

妇女点点头,领他们来到屋后的河埠头。

汪倾千、袁伯祥的逼租船已经逃离了村口。

袁世钊和吴志喜断定他们将逃向章练塘。于是两人当即决定直奔小蒸西北的殷庄头埋伏,狙击枪船。当枪船进入伏击地段后,农民军立即向枪船开枪射击,袁世钊一枪打中了船棚。汪倾千、袁伯祥仓皇逃窜。这时,附近各村的农民武装好几百人也迅速汇集到殷庄头。一时之间,枪声大作,口号四起,枪船上的水警吓得目瞪口呆,袁伯祥遭到船尾,偷偷跳水逃跑。汪倾千蜷缩在舱底,浑身发抖。最后,由于弹药供应不上,汪倾千、袁伯祥他们还是逃掉了。

“不捉住这几个吃人的吸血鬼,我袁世钊誓不为人!”袁世钊冲着宽阔的河面,发誓道,“志喜,我们去包围汪剥皮的老家。”

“对,抄他的老窠。”吴志喜也把牙齿咬得咯咯响。

“不过,”袁世钊转过脸来,对着吴志喜:“不能草率盲动。现在他们肯定有所防备,我们要伺机而动。”

两天后的深夜,袁世钊、吴志喜带领二十几位农民武装悄悄地包围了小蒸镇上汪倾千的院落。

此刻的汪倾千,正躺在花厅里的烟榻上,悠悠地抽着鸦片烟,哥哥汪士君和地保胡祖文坐在烟榻两边的花梨木椅子上,汪士君擦着枪,胡祖文气急败坏地说着话:“反了,反了,这批赤脚佬,还不是因为共产党在带着他们闹的。”

“哼,共产党,那个袁世钊,还有那个吴志喜,动不了我一根汗毛。他们纠集些赤脚佬,成什么气候!”汪倾千吐出一口烟,眯缝着眼,好象全不当胡祖文的话一回事似的,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有伯祥兄保护着,怕什么,他是国民党,掌了权的。”

而这时,袁世钊、吴志喜两人已经摸到了花厅

的格子窗前。农民军则已团团包围了这所高大的院落。

“嘭!”袁世钊一脚踹开花厅大门,大声喝叫:“不准动!”胡祖文尖叫一声,即瘫倒在地上,汪士君刚想举起枪来,袁世钊跨前一步已经手起枪响,汪士君应声倒下。汪倾千吓得声音发抖地求饶:“我不动,我不动,饶我一命,饶我一命。”象牙烟杆早已跌落地上,断成两段。这时,吴志喜举着枪,已经对准了汪倾千光秃、油腻的脑袋。

汪倾千、胡祖文跪倒在院子里。农民军团团围住他们:“你们盘剥百姓,无恶不作,今天是我们报仇的日子。”

“打死这盘剥穷人的老狗!”有人高喊,“他砸我的家,还打我的老婆。今天,我要出出这口恶气。”

袁世钊望着情绪激动的农民兄弟,大声说:“多少年来,地主土豪骑在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剥削我们,逼得我们饥寒交迫,今天,我们要审讯他们,镇压他们。”

吴志喜已经带了几个人,抱着一大堆田契、借据和帐簿,堆在一起,点火烧了起来。

“你们捉我的男人干什么,干什么呀?”汪倾千老婆从里屋蹿出来,看见农民军团团围住了自己丈夫,拍着大腿,叫骂起来,还冲到门口撕扭住吴志喜的服装疯撒野,气得怒发冲冠的陆龙飞,一个箭步冲上来,手起头落,把汪倾千老婆一刀砍翻在地。

随后,正义的枪声,又结束了这两个罪恶的生命。

这就是著名的小蒸暴动。

这几声响亮的枪声,划过漆黑的冬夜,震醒了这一片沉静了几辈子的土地。

农民军一鼓作起,9日,袁世钊又带领大家收缴了范浜、新镇团防局的枪支。

几天以后,为了战略移动,陈云、吴志喜率领青浦的农民军转移到枫泾农村,并和枫泾的农民军联合起来,合编成松江区农民革命军,准备举行枫泾暴动,切断沪杭铁路,支援浙江、浦东的农民运动。一时“农民要暴动”、“农民军要攻打枫泾”的传说不胫而走。“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起彼伏,村头村尾,甚至枫泾镇上也张贴着这样的标语。枫泾南、北镇上的地主土豪和反动

当局惊恐万状。

1928年1月11日早上,袁世钊的父亲急急找到正在大方庵的儿子,告诉了镇上的自卫团总周清怀、程夷谷昨天深夜雇了李麻子的船,两人已分别让自己的姨太太避到松江县里去了,还抬走了几箱细软。

“看来反动军警已经心虚脚软,准备逃窜了。”一听到这个消息,袁世钊兴奋地对吴志喜、陆龙飞说,“我们应该乘胜追击,攻打枫泾。”

两人也同意袁世钊的看法,一致决定立即发动枫泾暴动。

当天晚上,袁世钊、吴志喜、陆龙飞迅速召集起数十名农民军,他们系上红布条,带上枪支和大刀,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恶霸地主金海琴就住在屈家浜。虽然这几天风声很紧,他知道“共匪要抢镇”,尽管已经关照大小老婆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埋到了院子的北墙根下,但他还是相信薛团副昨天带过来的话“我手里的家伙不是吃素的”,因而不信“共匪”和农民真能“无法无天”到自己的头上。

“狗屁的农会,狗屁的共产党。”他坐在太师椅上,狠狠地咒骂着,骂过之后,他又摇头晃脑地哼起《圣谕广训》。媳妇红着眼睛从厢房里走出来,倚在门边,嚤嚤抽泣了几声,似乎满含着委屈向公公金海琴告状:“阿伯,你真要好好管教管教你那个不正经的儿子,今夜,他到现在还没回来,肯定又到枫泾那家醉花楼去了。”

金海琴一听到儿子就烦,不耐烦地说:“回来老子教训他一顿。”他朝媳妇一挥手,“睡吧,睡吧。”

媳妇却还是嘀嘀咕咕,话中有话地说:“你再不管教,我可要把丑事全抖出来,让大家都知道。”

金海琴把书拍的一声摔到桌子上,正待发作,突然,大门外响起了更响的“乒”的一声。

没等他反应过来,袁世钊已经踢开大门,一大队的农民军拥了过来。一条条红布,在灯光下,显得十分的耀眼。

愤怒象暴风似地卷了过来。

吴志喜和陆龙飞两人,一边一个,揪住金海琴的衣领,一把把他扔到地上,袁世钊捡起《圣谕广训》,翻了翻,朝吴志喜、陆龙飞笑了笑,“还圣谕,还

广训呢。”然后，“拍”地摔到了金海琴的脑袋上。

“饶命吧……，饶命吧！……首饰，钱……都在……”金海琴抱着头，喃喃地求饶着。

“首饰，钱，都要。”袁世钊向他喝道，“你作恶多端，罪该万死，今夜，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军还要你的命！”

顾桂龙他们已经搜出了田契，敲开了细木箱子，有人已经冲到后院，打开了粮仓。

“我们要杀死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愤怒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来。

这一夜，农民军转辗各村，先后镇压了金海琴、李善庆、李新发、李福龙等7名恶霸地主和他们的走狗，还烧掉了搜出的田契，分掉了他们的粮食钱财。

所到之处，农民群众都蜂涌而出，一簇簇火把映红了天空，农民们看到恶霸地主家的墙上张贴着“中国共产党松江第一独立支部”的署名，欢呼雀跃。

面对着一村一村群情激奋的农民群众，袁世钊激动万分，他对簇拥着农民军的群众，高声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还一一公布了恶霸地主的罪状。等大家回到革命军驻地大方庵的时候，袁世钊发觉自己的喉咙已经全哑了。

袁世钊和衣躺了一会，醒来，冬天的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寥廓的天宇，照得屋子里暖融融的。一个晴朗的冬日！

袁世钊从挎包里拿出笛子，吹起了他平时最喜欢的曲子《梅花三弄》。这是袁世钊从小就喜欢的一大爱好。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他经常把学生们招到宿舍里来，吹给他们听。

曲子清亮的音色，透过窗子，撩到了屋门前的那棵粗壮的黄桦树上。

这时，他的哥哥从村口走了过来。

哥哥告诉他，父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叫他千万要小心，时刻警觉。枫泾镇上，自卫团和商会这几天，到处在传言要抓捕共产党，格杀勿论。

“反动当局什么时候不磨刀霍霍呢？”袁世钊把笛子放在矮桌上，笑着对哥哥说，“现在，他们还不忍轻举妄动。”

“你太劳累，”哥哥望着袁世钊，“嗓子都哑了。”顿了顿，哥哥又说，“听阿伯说，他托我们隔壁的三

婶，给你说了个对象，姑娘是在镇上盛昌烟纸店里做事的，人很清秀、文气的。你什么时候有空，回趟家去，见见面。”

“我马上就会回来的。”袁世钊整了整皱巴巴的薄棉衣，站起身来。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心里一直思考着的攻打枫泾镇。“可是，我现在还不能结婚，一则农民运动方兴未艾，我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二来，我们现在武装暴动，反动当局恨之入骨，他们随时会疯狂反扑，我的头是悬在腰带上的，我不能连累人家。”袁世钊走到屋场上，凝望着远方，深沉地说，“现在父亲有你们照顾，我无牵无挂，我现在唯一希望的是打倒反动统治，让贫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袁世钊紧紧握住哥哥的手，“照顾好爸爸，谢谢哥哥！”他的眼角淌出了泪水。

这时，“共产党，扒平王，财主人，泪汪汪，一夜杀掉七只狼。”的民谣已经传遍了枫泾附近的村村户户。

1月12日，陈云来到枫泾农村。

袁世钊向陈云汇报了昨夜暴动的情况和当晚攻打枫泾的计划。陈云看到农民军士气高昂、攻打枫泾对推动农民武装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展有重要意义，当即同意当天晚上攻打枫泾镇。两人随即作了具体的研究。

事情突然起了变化，反动当局看到农民暴动势如海潮，惊恐万状，当夜从松江调来军队。得知这一消息，陈云、袁世钊他们立即决定暂缓行动，先派出一部分农民军去长浜里，处决了恶霸地主的狗腿子艾松泉。

1月15日，为了鼓舞士气，陈云亲自到草长浜向农民军和农会会员作动员报告。500多名农会会员击锣而来，蔚为壮观。陈云、吴志喜、袁世钊分别发表了演说，启发大家把地主土豪压迫剥削的苦楚统统诉说出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领导大家总有一天会打下枫泾，替大家报仇伸冤。这是一次诉苦会，也是一次枫泾暴动的誓师会。

农民们群情激愤，一时之间，锣声、口号声，在草长浜上空久久回响。

三人商定，1月21日（农历年底）攻打枫泾，并提出了“等待西风起，打到枫泾去”的口号。

这之间，激愤的农民军先后收缴了范浜、新镇、石弄泾、新中浜、界字圩等地保卫团和地主家的枪支弹药，还包围了枫泾与金山交界处的西乡韩家坞，在行政局长李伯贤及土豪曹体乾、张伯家家，收缴枪械。

枫泾暴动，蓄势待发，如弦上之箭。

这个时候，枫泾镇上的反动势力，如坐针毡，自卫团团总周清怀、程夷谷和商会会长吴获帆等多次密谋策划，连连向松江、嘉兴请兵求援。国民党反动当局从驻嘉兴的76军调一营兵力，由糜营长带领，松江驻军补充团派二连兵由薛团副带领，分水陆两路到达枫泾，伙同镇上的自卫团，部署了围剿农民军的计划。

1月19日黎明前，敌军由薛团副、糜营长指挥，兵分两路，一路沿铁路，一路乘船经白牛塘，向在大方庵、蒋家浜、库浪的枫泾区委和农民军驻地进行围剿。敌人的突然袭击，再加那天大雾弥漫，看不清有多少敌人，等到发现时村前村后都已有敌人举枪在搜索，危急之中，吴志喜、陆龙飞立即率领农民军与敌人激战。敌人蜂拥而上，吴志喜、陆龙飞和农民军英勇战斗，子弹打完了用砖头、石块与冲上来的敌人搏斗，终因力量悬殊，不幸被捕。在库浪的袁世钊、顾桂龙、王子琴听到蒋家浜的枪声，马上率领农民军向西南方向撤退，边打边撤，突破了敌人的包围，渡河向青浦小蒸方向转移，脱离了险境。

敌人挨村挨户搜查捕人，前前后后被捕农民军和群众达60多人。大部分农民经枫泾镇上的店铺保释，而吴志喜、陆龙飞等6人却被国民党押解松江。陈云、袁世钊等24人遭敌人通缉。国民党反动派还到处张贴布告悬赏“如有将首犯拿获者，每名赏大洋300元。”

第二天，陈飞、袁世钊冒着生命危险，赶到松江营救吴志喜、陆龙飞，通过关系，疏通狱中看守，送信给吴志喜、陆龙飞，告诉他们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吴志喜、陆龙飞接获消息后，也传出信息说：“你们赶快离开松江，这里危险不能留，我们已准备牺牲。”吴志喜、陆龙飞后来由于暴露身份，被反动当局视为“要犯”，营救未果。1月26日，吴志喜在松江小校场，陆龙飞在枫泾文昌阁同一天英勇就义。他们视死如归，临刑前还慷慨陈词，振臂高

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敌人除了悬赏通缉，还丧心病狂地到处抓人。尽管四处搜捕，还是抓不到袁世钊。2月7日晚，枫泾地痞马伯康带领军警，抓走了袁世钊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严刑拷打，威逼他们说出袁世钊的行踪，父亲和两个哥哥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始终咬紧牙关，敌人恼羞成怒，一直关押了10个多月，但仍一无所得。

四

一片白色恐怖！

陈云秘密来到嘉善魏塘镇。他在舅母陪同下，雇一小船径直到了舅母的挚友、魏塘道院弄李桂卿家，化名李介生，与李桂卿叔侄相称，叫李佳卿夫妇为三叔三婶，对外佯称李家宗侄，因病失业，回来暂住，就这样在李家的矮楼西坡屋断断续续住了半年多时间。

袁世钊、顾桂龙、王子琴则秘密转移到上海。期间，袁世钊多次秘密到嘉善与陈云会面，与陈云商讨白色恐怖下农民运动的方向，以及如何开展农民暴动。每一次到魏塘，他都住在表兄徐山涛家，并向徐山涛宣传革命道理。徐山涛在袁世钊的引领下，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

“志喜、龙飞壮烈牺牲，农运骨干损失严重。”陈云坐到八仙桌旁边，沉重地说，“形势十分严峻。”

“现在反动派的气焰十分嚣张，地主土豪带了武装四处逼租，还威胁农民‘不交租，就是共产党’，扬言要捕人杀头。”袁世钊由于情绪激动，刚说了两句就咳了起来。

“必须重建党组织，恢复农会，继续开展武装暴动，”陈云提高语调，“给反动势力沉重打击！”

1928年七、八月间，也就是枫泾暴动半年以后，袁世钊、王子琴、顾桂龙先后秘密返回了枫泾。

袁世钊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反动军警和土豪劣绅的严密控制下，昼伏夜出，在农民中间继续进行宣传发动。农民见到他们回来，增强了革命斗争的信心。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党组织和农会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重建了中共枫泾区委，还先后组建了50多个支部，发展党员600多名。

农民协会的旗帜又竖起来了!如火如荼的抗租抗税斗争,又在各地蓬勃展开了!

《申报》1928年10月24日刊载的消息称:“前晚枫泾西栅外,又有共产党开会,聚众数百人之多,并在距镇不远处密布步哨。”可见,当时农民运动的声势之巨大。

敌人恨之人骨。国民党反动当局几次派军警袭击中共枫泾区委所在地,王子琴、薛照生等多名党员被捕,枫泾区委再次遭到破坏。

1928年9月,袁世钊由中共江苏省委派往镇江担任县委书记,同年底又回松江担任中共松江县委领导成员。他回松江后仍分工负责枫泾地区的工作。枫泾区委第二次遭破坏后,农民运动又一次遭到挫折,袁世钊忧心忡忡,在写给淞浦特委的报告中,他沉重地说:“农民领导损失亦多,白色恐怖达到最高度。”

1929年春,陈云再次来到嘉善。黄昏时候,陈云乘船到了丁栅夏家甸。在夏家甸的上海泰山砖瓦公司泥坯工场里,袁世钊、顾桂龙等五六位同志已经等候着。吃过晚饭后,陈云传达了淞浦特委要求农民运动向国民党反动统治薄弱地区转移的指示。

袁世钊提出了枫泾地区农民运动向枫泾西翼的姚庄、里泽、枫南转移的设想,当即得到了陈云的支持。

“我们在姚庄、里泽、枫南一带运动,可以很好地牵制枫泾的反动势力,支援松江、青浦的农民运动。”袁世钊说。

“各自点燃烈火,然后东西呼应,很好”陈云赞赏地望着袁世钊。

当晚,与会同志离开夏家甸,随即分头到各地活动。

那时候,姚庄、里泽、枫南一带的农民,由于土豪劣绅的严重盘剥,民不聊生,男的都去做长工,女的则去做阿婆(佣人),常常因交不出租米吃官司,没法活下去。贫苦百姓的胸中都充满着怒火。枫泾暴动时传出的民谣“共产党,扒平王,财主人,泪汪汪,一夜杀掉七只狼”,在这里的村村浜浜到处流传,几乎人人会唱。

一个春天的下午,袁世钊来到了姚庄。

袁世钊与姚庄陈天浜的中共枫泾区委委员盛阿贵,先后两次在陈天浜盛富根大屋里召集当地骨干,秘密分析姚庄地区的形势和枫泾暴动对姚庄贫苦农民的影响,研究发动农民的办法。他们在争取了镇上绅董张书岩的同情后,即利用当地群众做“佛会”的场所洪福庵,揭发地主的罪恶,宣传共产党革命的主张。

袁世钊的演说极富感染力,他高声说:“土豪劣绅黑心肠,重租高利盘剥农民,克秤短两借出,大斗大斛量进,‘青苗田’借6斗要还1石,压得我们吃不饱饭,透不过气。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才有得饭吃,有好日子过。”

三天“佛会”,吸引了大批农民前来听讲。在此基础上,发动农民成立了塘东农民协会,有近40多农民踊跃参加。农会骨干盛阿甫、盛小五、谢阿六等,几乎挨家动员,一时之间,“共产风潮”迅速暴发,农民们到处“请财神”,要地主土豪交出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

眼见姚庄农民运动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袁世钊即乘胜前进,在盛阿贵的引领下,渡过茜泾塘来到里泽鹤脚浜。他做通开明人士黄三松的思想,利用他的身份,在他家的楼上几次与骨干黄福生、黄九和、钱阿浩、吴金荣、朱金福等商量,后来甚至连国民党里泽区分部委员李芹斋也参加了会议。袁世钊一一叮嘱,要大家一定要讲清楚“共产党来了,田地归种田的穷人,租米可以不交”,“这样,农民才会乐意跟我们走。”袁世钊说。

随后,黄福生、钱阿浩等走门串户,一下子串联了七八个村,农会组织从鹤脚浜一直扩大到杨家浜、费家浜、蒸斗浜。

抗租抗税斗争,也如袁世钊预期的那样,在里泽发动起来了。

姚庄、里泽农民的斗争口号,传到嘉善,反动当局十分震惊。他们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有星火燎原之势,于是迫不及待地残酷镇压。他们多次派遣保卫团团总蔡示和、范善权带领大队人马到姚庄、里泽进行大规模扫荡,农会骨干20多人,先后被敌人捉去。姚庄农运领袖盛阿贵、里泽农运领袖黄福生等都被反动当局残酷杀害,李芹斋也被搜捕入狱。

姚庄、里泽的形势急转直下。敌人叫嚣:“掘地

三尺,也要捉到共产党首领袁世钊”。袁世钊不得不再次转移。

1930年1月,正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时候,袁世钊悄悄来到枫南网埭。

受枫泾农民运动的影响,枫南的农民在1928年冬开始与土豪地主进行斗争。袁世钊一到枫南,就联络阿勤仙、邬勤仙两人,希望两人带领当地农民,开展武装暴动。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袁世钊对大、小勤仙说,“我们要让反动当局看看,农民运动是扑不灭的,革命的火种将在各地熊熊燃烧。”袁世钊握紧拳头,革命的激情溢满胸间。

就这样,50多名农会会员,终于在网埭的解缆浜、戴夏浜鸣锣而起,开展暴动。他们唱着“枫泾暴动”后流传的民谣,喊着“向土豪劣绅开火”的口号,掀起了“扒平王”式的农民暴动,前后40天时间,清算了30多户地主土豪,收缴了他们的钱财和粮食,大部分分给了缺衣少吃的贫苦农民,余下一部分则留给作为暴动队伍的活动经费。这次暴动,使附近的地主土豪惶惶不可终日,纷纷逃窜,再也不敢在乡里仗势逞凶,欺压百姓。

网埭暴动,再一次震动了枫泾、嘉善的反动势力。

3月18日夜,枫泾国民党保卫团程夷谷带着雇佣军,突然开进,把解缆浜、戴夏浜前后堵住,敌人围住村庄,挨家挨户搜捕“共产”分子,四处开枪,并扬言:“袁世钊这次插翅难飞。”

恰巧前一夜,袁世钊因为要赶回松江向县委汇报工作,离开了枫南。

气势汹汹的敌人,又一次扑了空。搜捕一个通宵,他们抓去了19名参加暴动的农会骨干,其中7位同志,还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枫泾文昌阁。

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的围剿,使农民运动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袁世钊在枫泾的家,整日由自卫团监视,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父亲和哥哥,一次次被盘问和拷打。

敌人正在密谋大规模搜捕袁世钊的计划;袁世钊被迫再一次转移上海。

五

袁世钊住进了沪西善钟路14号、党组织为他

安排的一间南货店里。他还是时刻挂念着枫泾地区的农民运动,想马上回去组织农民武装。

一天,袁世钊去世界书局门市部购书,在样书柜前,正巧碰到了同样避居上海的顾作之。两人十分高兴,袁世钊拉着顾作之,佯装翻看新书,向他介绍了枫泾农民暴动的经过以及自己的想法。

“我还要回去组织农民暴动,这是党的任务,虽然现在国民党血腥镇压农民运动,一片白色恐怖,我还是要回去,那怕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袁世钊握着顾作之的手,兴奋地说。

然而,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要求袁世钊暂缓回乡。

在南货店后面的那间小亭子里,袁世钊看看书、吹吹笛子,以排遣胸中的郁闷。那天午后,他刚放下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拿起笛子,吹奏他最喜欢的《梅花三弄》,突然,门被踹开,十几个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身前身后,几支枪对准了他。

袁世钊被捕了。时间是在1930年1月21日。

原来,国民党反动派从判徒口中得知袁世钊、张杏松已转移到上海隐避,便派魔爪跟踪到了上海,密探在袁世钊、张杏松可能经过的马路上昼夜巡探。21日上午,张杏松被发现逮捕,他们从张杏松身上搜出了袁世钊的住址,就这样,袁世钊随即被敌人逮捕。

国民党一开始把袁世钊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后来又押解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监。

袁世钊身陷囹圄,受到残酷折磨,但他毫不畏惧,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和自己的身份。

狱吏又一次把被打得昏死过去的袁世钊拖到审讯官面前。

“只要你告诉我们陈云在哪里,我们马上可以放你出去,不仅放你出去,还让你吃好穿好,过老爷生活。”审讯官假装笑咪咪、柔声细气地说。

“我不认识陈云。”袁世钊虽然声音微弱,但却凛然不可侵犯。

“那么,你告诉我们在枫泾跟你一起‘革命’的你的那几个‘同志’也可以。”

“我不知道枫泾在什么地方。”

“胡说!你一口枫泾口音,还想撒谎?”审讯官终于按捺不住恼怒,“再给他点厉害尝尝!”他咆哮

着吩咐左右几个打手。

敌人七手八脚按住袁世钊的手脚，一个打手残忍地割开袁世钊的背脊，顿时，袁世钊的背脊上鲜血直淌，一片殷红，“拿盐来。”另一个打手喊。于是，大把的盐被嵌入割开的背脊里，钻心的痛，使袁世钊又一次昏了过去。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酷刑面前，袁世钊还是咬紧牙关，坚决不吐露有关党组织的一个字。

此时此刻，袁世钊经常回想起那一年他入党时的情景，恽代英、萧楚女的音容笑貌在他的眼前不时闪现。他从党组织那里知道这两位他十分敬仰的革命者，先后都已英勇就义。在狱中，两位革命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气吞山河的气概。他决心以这两位革命者和他的几位战友为榜样，决不玷污共产党这一神圣的名字。

他咬着牙，挺住了一切。

敌人无可奈何。

不但如此，袁世钊还在狱中秘密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与管文蔚、茅呈等狱友为改善政治犯待遇，领导难友开展绝食斗争。

乘放风的机会，袁世钊悄悄找到管文蔚、茅呈：“我们共产党员，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袁世钊佯装锻炼身体，挥动着双手，继续悄悄地说，“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狱友开展各种斗争，包括越狱。”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又到了放风的时候，袁世钊把一小块他用指甲划过三道杠子的面包皮拿在手里，在狭小的院子里，狱友们三三两两从袁世钊身边擦肩而过。这是绝食的暗号。

这次持续数天的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放风时间延长了些，饭菜也增加了许多。狱中斗争取得了胜利。

袁世钊被捕后，党组织和陈云一直在积极设法营救，经常派人以亲属名义前去探监，传递信息。党组织把正在设法营救和要求他们作好越狱准备的指示，写在小纸条上夹在面包中间递到了袁世钊手中：“袁：配合苏州伤兵暴动，组织集体越狱。”

袁世钊要来下次探望之际，送条鲇鱼来，在鲇鱼肚里塞把锉刀。通过一条细细的墙缝，袁世钊

把越狱的计划一个个传递了过去。难友们群情激奋，一个个把镣铐锉开，等待明天的行动。

突然，当天夜里，袁世钊被敌人叫出去提审。

原来，松江地主蔡仲瑜不知从什么渠道获知袁世钊已被捕，便勾结枫泾区区长陈占奎、镇长叶劲秋、自卫团团长周清怀、商会会长吴荻帆和封建大地主叶桐叔，连连向江苏高等法院告发，那天傍晚，他们还带着两个“证人”李福琴、艾银余赶到了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监。

袁世钊的身份彻底暴露。越狱行动也遭夭折。

袁世钊危在旦夕！

然而，在第二天的“法庭审问”时，袁世钊仍然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他再一次否认认识多年来朝夕共处的陈云同志，敌人每一次威逼利诱，他都以“不知何人”、“没有见过”，对付敌人。

叛徒李福琴、艾银余气得直跺脚，手指着袁世钊语无伦次地“对质”：“就是你这个袁世钊，和陈云一起，策划我们武装暴动，斗地主，分田地。你……你，还……还这样抵赖？”

袁世钊锋利的目光，使这两人浑身发抖，再也说不下去，然后，对着他们轻蔑地说：“你们大概是鬼敲头了吧，我怎么会认识你们这种东西。”

及至到后来，审讯大堂变成了袁世钊宣传革命的讲堂。他慷慨激昂地在大堂上向群众演说达一个小时之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党的道理，表示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国民党反动势力必败！义正词严，神情自若，使周围群众无不为之动容。

监狱当局一时十分尴尬，急急地宣布庭审结束。

当天晚上，袁世钊即被秘密转押到了镇江，被关在长江边的一间破败阴湿，而又戒备森严的小屋里。

袁世钊自知这一次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放过他。他向敌人讨来笔墨，写下了给党组织和家人的遗书，并托一个同乡难友，辗转带了出来。两封遗书书法挺秀、词意慷慨，看得出袁世钊对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他毫不畏惧国民党反动派将要枪杀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唯一的遗憾是自己将等不到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下转第26）

我们万众一心

◆ 嘉善报编辑部集体采访

从今年6月7日入梅以来,罕见的连日暴雨冲刷着杭嘉湖平原,吞噬着绿色的田野,圩岸垮了,农舍倒了,渔塘没了,公路遭淹,连田间的电线杆也倒地断裂。人员和农畜被困在大水之中,而老天爷还在作对,雨仍然下个不停。到7月2日上午6时整;降水量已达611.5毫米,比我县有史记载最高纪录还大282.1毫米。地势低洼的几个乡镇从6月28日以后就被浸泡在水中,成为一片汪洋,处于十分紧急状态……

俗话说:“洪水如猛兽”,群众的生命安全,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怎么办?怎么办?县委县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全县人民万众一心,投入抗洪抢险、保卫家园的斗争。

一、天有不测风云

嘉善河流西承嘉兴、太湖来水,北入阳澄淀泖滞蓄,东排黄浦入海,地势低洼,港荡众多,是杭嘉湖平原平均水网密度最高的地区。建国以后,嘉善的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特别是江苏太浦河工程开挖以后,北排通道被阻,过境水大增,使历史上的洪水北泄,变成了北水南压。面对水系的变化,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嘉善进行洪涝旱综合治理,尤其是1991年春夏之际,嘉善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江泽民总书记亲临嘉善视察灾情,对抗洪救灾作了极为重要指示。在江泽民总书记指示精神鼓舞下,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兴修水利、修建圩区的一系列决议。全县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年年奋战圩区,大搞水利建设,基本上能控制一般年份的洪涝旱灾害,能抵御重大的洪涝灾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6月7日入梅以来,嘉善连降暴雨,水位急剧上升,尤其6月24日至7月1日的一个星期内,降水量达到611.5毫米,如

此集中的降水量为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加上上游过境客水的骤然增加,使得嘉善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洪涝灾害。到7月1日上午7时,水位高达4.39米,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水位。

4.39米的水位,意味着整个嘉善地势比吴淞高程水位要低0.72米。

4.39米的水位意味着来自太浦河和黄浦江的两大水系,随时都可能倒灌进嘉善县,整个嘉善已面临灭顶之灾……

全县人民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从6月24日就已经投入抗洪抢险,但是由于整个嘉善的圩区高程已经处于洪水水位线之下,在雨量集中超历史、暴雨天数集中超历史、受灾区域范围超历史、水位上升超历史的情况下,洪涝灾害给嘉善所带来的损失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嘉善自身的抗洪防灾能力。

暴雨连天,洪水泛滥,水位暴涨,人民受损,洪灾给嘉善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在灾区,放眼望去,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再也分不清哪是渔塘,哪是良田,哪是河流,哪是道路,到处是受灾的群众,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到处是停产的企业,到处是淹没的村庄,到处是决口的堤岸;农田大片受淹,5000多亩西瓜烂在水中,数万亩蔬菜绝收,鱼塘大面积崩溃。一位承包二十多亩鱼塘的农民流泪说:“我投入了二十多万元,现在鱼塘塌了,鱼苗幼鳖都冲走了,我拿什么去还贷,我已经倾家荡产了。”

据初步统计,这次罕见的洪涝灾害给嘉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已达7亿多元,由于高水位持续不退,灾情还在加剧,损失还在加重。

二、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

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县委县府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灾情,研究对策,要求全县各级领导把抗洪抢险工作作为全县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一切服从和服务于抗洪救灾,党员干部到第一线去,组织群众抗洪,立足于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夺取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主要领导分片包干落实到乡镇,分赴320国道以北的重灾乡镇坐镇指挥抗洪。从6月30日起,嘉善成立抗洪抢险指挥中心,由主要领导负总责,下设抢险组,人员物资转移组、车辆物资调运组、社会治安卫生保障组和材料信息组,统一指挥全县抗洪抢险。依法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